



强化创新驱动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以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赋能高质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江琳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2.8%,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7.08%;“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过去5年,创新成果不断从“书架”走上“货架”,进一步在生产生活的实际场景中落地开花,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近日,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探讨“十四五”时期大规模研发投入的实际成效、对全要素生产率 and 经济增长质量的真实影响,并对“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动能转换、潜在增长率以及政策着力点进行前瞻性分析和研判。

进一步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多个研发投入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请问在您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有哪些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王一鸣:“十四五”时期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之一,就是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时期这五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2025年达到39262亿元,投入强度提高至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到第10位,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三大科创中心分列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第1、第4和第6位。

从更重要的科技创新实际成效角度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5G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崛起,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综上所述,我国不仅在统计意义上,而且在实际进展上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渠道不畅、动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迫切要求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体系,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推动建设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形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

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高校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

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有利于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

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证券时报记者:研发经费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随着人口红利消退、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正成为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您认为“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科技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对冲了传统要素投入下降带来的增长压力?

王一鸣:据初步测算,“十四五”时期,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收缩,包括人力资本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3%,比“十三五”时期下降3.19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44%,比“十三五”时期大幅回落19.25个百分点,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减弱。虽然受到美国“小院高墙”、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达到27.73%,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劳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年均5.4%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从基础研究占比、企业研发转化率等指标来看,我国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王一鸣: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7.08%,创历史新高,基础研究经费总额约为2780亿元。随着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我国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

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但仍要看到,与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仍低于经合组织国家15%—20%的水平。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渠道不畅、动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迫切要求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体系,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推动建设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形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环境。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应避免一哄而上

证券时报记者:您曾提出要“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最紧迫的制度性改革是什么?

王一鸣:最紧要的还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新型生产要素,包括数据、技术等自主高效流动和优化组合,这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要加快培育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数据基础制度,更好释放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完善技术

要素市场,畅通科技成果向先进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证券时报记者:在“十五五”时期,应如何避免部分地区因追求增速目标而陷入“低效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

王一鸣:“十五五”时期,在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等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投资冲动将趋于减弱,但一些地方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冲动依然较强。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往往造成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如果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比传统产业会更大。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部分企业面临“内卷式”竞争和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应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

王一鸣:当前,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行业“内卷式”竞争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更好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多措并举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是把扩大投资和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在财税政策支持上,要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有利于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在金融支持上,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知识产权、数据、技术为核心资产,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知识产权、数据、技术难以准确估值的问题,既能够促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有利于研发投入更好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

高端访谈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

颠覆性创新筑基“人工智能+” 科技金融破解成果转化瓶颈

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节点。

近日,围绕“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核心痛点等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她认为,人工智能仍将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主线,需在算力、算法、数据三大基础领域实现颠覆性创新;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从1到10”的核心瓶颈,需要科技金融体系的全面赋能,引导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全链条创新。

人工智能引领科创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将面临哪些新的形势?

赵晓光:中共中央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前瞻性地提出“人工智能+”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而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过程中,数据、算法、算力三大基础元素至关重要。需要在三方面都取得颠覆性的创新和突破,才能为2030年乃至2035年全面进入智能化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机器人技术在哪些方面可能实现更大规模的突破?

赵晓光:随着大模型成为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智能,能够替代人类的体力和智力。

在制造业,大模型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赵晓光

正深入生产线、物流、采购和管理等环节,替代部分人工工作。特别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作为“人工智能+”中极具代表性的方向,并非替代传统工业机器人,而是替代人类完成工业机器人无法完成的柔性化、需双手或多机协作的工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生活中,面对严峻的养老问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望在家庭和机构养老中提供更易被接受的服务。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大概需要多久?还有哪些关键环节需要突破?

赵晓光:一个智能系统要进入家庭并提供贴身服务,需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一是足够聪明,能成为助手而非累赘;二是安

全,不能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三是性价比合适,价格普及可承受。预计未来十年需着力解决这三方面问题。

“十五五”时期,我们需要在硬件、软件、算法上取得创新甚至颠覆性进展。目前主要依赖模仿学习、强化学习、端到端训练等方法,但我们需要探索更新的路径。例如,借助脑科学、量子计算等新方法、新算法,让机器人在自主感知、决策、操作以及硬件能力、算法速度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时期将是关键突破期。

提案落地见实效 护航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请您分享一下过去一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感受。您曾多次关注科技成果转化,是否感受到相关机制的优化?您的哪些提案建议得到了有效落实?

赵晓光:我在2025年的提案主要涉及自动驾驶(特别是L4级在物流中的应用)落地,以及如何更好发挥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成果转化中的主动性。这些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和落实解决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两会您主要关注哪些方向?

赵晓光:今年我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社会治理与法律规范前瞻性布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深入应用,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如责任认定、数据来源与合规、敏感信息保护等。

若法律约束过于刚性,可能制约技术发展。因此,建议先从前瞻性社会治理入手,增强技术主体(如科研机构、企业)的责任感,建立AI伦理检验机制。同时,需提

高全民AI素养,让公众理性认识、判断和使用AI。当全民认知提升后,法律规范便能更自然地发挥作用。

为创新培养人才

证券时报记者:国家正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您对科技金融如何更好服务科技创新有何建议?

赵晓光:成果转化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金融服务。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往主要靠国家投入,我期待“十五五”时期,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力量更多参与基础研究,为后续成果转化扫清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协同育人。您如何理解教育体系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关系?理想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应包含哪些要点?

赵晓光: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赋予了高校新的战略使命。这非常重要,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顶尖人才,形成了显著的人才红利。

近年来,我们看到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已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力推广科技创新教育,例如让中小学生走进实验室、参与了解国家级项目,在科学家身边成长。同时,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投入巨大,旨在培养顶尖的产业人才和工程师,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十四五”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策略,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已探索出具有实效和可操作性的道路,为未来创新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 张懿宸

“受基金期限刚性约束、业绩承诺力度有限、部分有限合伙人(LP)追求短期回报等因素影响,并购基金参与并购重组仍存在诸多现实障碍。”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张懿宸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十九个年头。他再次关注并购基金这一领域,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并购基金参与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他建议,应持续完善并购基金各项政策,进一步提升并购基金的市场活跃度,从而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释放并购基金活力

私募股权并购基金作为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重要主体,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推动行业整合升级、助力上市公司做强做优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张懿宸说,并购基金持有大量细分领域的优质标的,不少是“隐形冠军”,不仅可助力上市公司开展产业并购、优化产业链布局,且上市公司并购此类资产时多采用股份支付及配套融资模式,并购基金由此成为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后,凭借专业整合能力也可提升上市公司的整合成功率。

然而,并购基金参与上市公司产业整合目前仍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比如,业绩承诺、对赌安排等方面的监管政策较为严格,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并购基金与上市公司协同开展产业整合;穿透审查、同业竞争认定等方面的监管规则也与并购基金运作模式存在适配性不足的情况。

为充分释放并购基金活力,张懿宸建议监管部门可根据业务类型与并购属性,适当放宽业绩承诺、对赌、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鼓励持有优质产业资源的并购基金,与产业上下游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建议监管部门关注并购基金的合理退出诉求,不将其固有的退出属性与耐心资本简单对立,通过进一步完善并推广S基金、接续基金等工具,为存续期届满的并购基金提供合规顺畅的退出渠道,确保基金退出不影响管理人对上市公司的长期产业整合规划;监管部门可基于并购基金综合实力、运作规范性及特定行业整合经验,筛选并重点支持头部并购基金管理人参与零售、供应链、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整合,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标杆式案例,引导市场形成长期产业并购的良性导向。

进一步优化QFLP税收政策

张懿宸今年还建议进一步优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税收政策,以持续引入境外资本,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动力。

QFLP试点在我国已推出逾10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约50个城市出台试点政策,截至2025年,全国范围内已累计设立超过500只QFLP基金,实际募集资金认缴规模逾6000亿元,成为吸引外资参与境内股权投资的重要通道之一。

在QFLP制度框架下,一方面允许获得试点资格的投资机构在境外筹集美元资金,并通过QFLP渠道结汇转换为人民币,进而以人民币形式投资境内企业股权;另一方面,当境内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时,境外投资人可通过QFLP渠道将投资本金和退出收益兑换回美元并“离境”。张懿宸说,我国QFLP资金主要来自北美、欧洲、新加坡等成熟资本市场,近几年中东主权基金占比也显著提升。

张懿宸表示,在去年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现,针对QFLP的税收政策执行口径发生了一些调整,不少国际投资者也都对此高度关注,希望相关政策口径能够得到进一步明确和优化。

整合跨境投资模式税收规则

为持续引入境外资本、增强我国投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张懿宸建议,财税部门应尽快整合跨境投资模式的税收规则,正式明确统一“被动投资”与“主动经营”的税率标准,同时明确不追溯历史所得,给予经营主体过渡期。

此外,张懿宸还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给予一些特定情形下的优惠税率鼓励。比如对投资硬科技、先进制造等国家鼓励产业的QFLP配套优惠税率,更好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可依托海南自贸港、上海临港等区域打造“开放特区”示范效应,对符合条件的QFLP保留优惠税率。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
用好并购基金 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宸